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梁 工 卢龙光 主编

先知书

启示文学解读



赵 宁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易经文化解读书系

陈王 卢俊杰 主编

先知书

白晝光華解讀



趙平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梁 工 卢龙光 主编

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

赵 宁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赵宁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ISBN 7-80123-572-X

I. 先... II. 赵... III. 圣经-宗教文学-文学研究 IV. 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718 号

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

赵 宁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伟达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1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80123-572-X/B·193

定 价: 18.00 元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总序

梁 工 卢龙光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是“经典宗教”，因为这三种宗教都有一部被称为“神圣经典”的圣经。犹太教的圣经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中称为《旧约》的部分；基督教的圣经除《旧约》外还包括《新约》部分。伊斯兰教的圣经又名《古兰经》，其中不少人物源于犹太教圣经和基督教的《新约》。

这三本圣经不但有一部分内容及人物相同，而且都出自中东地区，源于亚伯拉罕的传统；其作者都相信宇宙间只有独一之神，并称其圣经有固定的文本，内容不能添加也不能减少。^①这三大宗教对圣经的基本理解是“上帝之言”，^②即其中记载了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凡人的语言。这三种宗教都认为，上帝是一个自有永存的生命，既不需要被人证明，亦不能被人找到，而是他主动透过不同的形式向人说话，即藉梦境、先知、自然界及历史事件等向人显明。对于基督教来说，上帝更是亲自进入历史，道成为肉身，在时间、空间、人群中活生生地向人显出真理和生命的真谛来，此即“上帝的话语”成为圣子耶稣向人启示。由此，这三大

宗教不但都被称为“经典的宗教”，更被称为“启示性宗教”。相对而言，其他宗教都注重人的经验、顿悟和自我寻索，是人追寻生命与神圣的结果，不可能以固定的文本为圣经。只消稍微数算一下佛经和道藏的浩瀚数目（况且还能继续增加），便可知晓个中的差别。

对基督教来说，上帝的伟大与智能是不能被有限的人所全面认识的。人只能透过上帝对人的启示去认识他，一方面透过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历史和文化去认识，此即“自然启示”或“普遍性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另一方面透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由特定人物写成的圣经去认识，这是所谓的“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③由于“自然启示”须经“特殊启示”的解释才有价值，圣经的启示便是基督教信仰、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权威，也是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从信仰及神学的角度看，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从现实的角度说，它只是一本由人写成的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套”66卷（天主教、东正教的卷数较多些）连在一起的书，这就是拉丁文“ta biblia”及英文“bible”的含义。公元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克利索斯顿以拉丁文阴性单数名词Biblia指称圣经，意思是“惟一的书”，从此Biblia或The Bible便成为基督教经典的专称。^④

任何接触过基督教圣经的人都会发现，这部经典分为《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两部分。何以如此？关键词是“约”。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与人“立约”并且“守约”的上帝。^⑤据圣经的首卷《创世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将管理世界的责任交给（创1：26-28），赐予人自由意志可作各样的选择，只是约定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而人的





始祖选择叛逆上帝，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上帝便按照约定的结果执行，使人的始祖痛失乐园，肉身“归于尘土”。但后来上帝又与人重新立约，圣经分别记载了挪亚之约（创 6: 18 - 22; 8: 20 - 9: 17）、亚伯拉罕之约（创 12: 1 - 3, 15, 17; 22: 15 - 18）、摩西之约（出 19 - 20; 24: 1 - 8; 31: 12 - 18）、大卫之约（撒下 7），以及先知耶利米所论的新约（耶 31: 31 - 34）。

“新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出埃及时与上帝所立的“摩西之约”，必须另立新约。旧约与新约的不同之处在于，旧约的律法写在石版上，而新约的律法写在心版上；相同之处是“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 33）。根据这个应许，耶稣开启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强调内心超过外表对神人之约的忠诚，称义是凭着信心而非单凭可见的行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像旧约时代立约时献祭的祭牲，但耶稣一次牺牲立下新约（林前 11: 25; 路 22: 20）就永远有效（来 9: 11 - 28）。因此圣经中的《旧约》是指耶稣以前的书卷，也就是犹太人的经典，而《新约》则指成于由耶稣开创之新时代的书卷，包括记载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以及耶稣的跟随者所写关于他们如何延续耶稣使命的《使徒行传》及书信等。

圣经虽是“上帝的话语”，却透过人在历史中的经历领受，并由人所书写。《旧约》的 39 卷书共 929 章，所涉历史时段超过 1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400 年），传统主张的作者超过 20 位，如摩西、大卫、所罗门、诸先知、以斯拉、尼希米等。但《诗篇》中的许多诗歌作者不详。即使传统认为是摩西写成的五经，其内容包括了摩西去世的情况，肯定也有部分章节非摩西本人所写。《新约》的 27 卷书共 260 章，涉及的历史时段较短，大约只有 80 年左右（公元 1 世纪 40



年代至2世纪初),传统认定的作者起码有8位,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雅各、彼得和犹大。事实上书写《约翰福音》与“约翰书信”和《启示录》的约翰很可能非同一人。而13卷保罗书信中只有7卷被大部分学者同意出自保罗,其他6卷则被认为来自保罗的跟随者。^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详,从其内容可见是一个与犹太教关系密切的基督信仰者。《旧约》的作者可能全部是犹太人,《新约》的作者大部分也是犹太人,但《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出自同一人)和《约翰福音》的作者则可能是外邦人。其实,圣经的重要性或其被尊为神圣基本上与作者无涉,而是由于其内容被当时的人所重视和接受,视为源自上帝。

据圣经学者研究,《旧约》的主要经卷皆源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经过一段时期流传才成为文字;即使成为文字后,最初也非完整的书,而是又经过一段时间编辑修订,才形成卷籍。故强调某卷书是那个作者所写,只是一种现代观念;该卷书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可能与那位被命名的作者有关,以至认识他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验对理解该卷书会有所助益。但还有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即认识与那卷书形成有关的信仰群体,因为他们的经验与该卷书的内容肯定发生过互动关系,以致那卷书产生了意义而被不断地诵读、解释与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经卷包含了特定信仰群体的经验,故此认识他们的历史处境与经验,对后人了解该经卷非常重要。

《新约》所涉及的历史虽然很短,四卷福音书亦同样经历过信仰群体口头传递,写成文字,再编辑修订,形成定本的过程。而对四卷福音书进行比较时,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看出传递及保存其信息及文字的信仰群体对耶稣言行的不同经验和看法。它们能出现在同一本圣经之内,则表



现出一种多元而统一的关系。^⑦从信仰及神学的角度说,统一性是同一位上帝主动向人启示的结果;多元性则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的人对同一真理的不同体验与响应。

基督教被称为“一本书的宗教”,^⑧若离开这本书即圣经,就会不复存在。所以圣经是基督教的基础;研究圣经是研究基督教的基础。圣经研究在西方已进行了两千年,所涉范围及所用方法非常广泛;所涉的学问也多种多样,包括考古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历代学者研究圣经文本内含的意思(the meaning within the text)、文本背后的意思(the meaning behind the text),也研究文本面向的世界(the world in front of the text)。后者特指圣经对现代读者的意义除了可透过不同学科如文学或社会学来解释外,亦可从读者的观点及其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读者对圣经的回应来观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圣经诠释在不同时代、地域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源源涌现,早已酿成一门蔚为壮观的大学问。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许多学者投身于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研究,而他们大都来自哲学系及历史系,是在原先的学术基础上转而研究宗教的,其中不少人关注的乃是基督教思想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他们借助研读一些西方神学著作来讨论宗教问题,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尚未摆脱“自然启示”或“普遍性启示”的范畴,仍是在第二个层次从事学术活动。若想真正认识基督教,必须认识基督教的根基圣经,在“特殊启示”的范畴中进行研究;而只有圣经研究才是对基督教原始文本的研究,才是首要的基础性研究。由于圣经堪称西方文化的重大聚焦点,自80年代初期以来,“圣经类”图书在国内市场上一一直畅销不衰。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圣经故事、圣经诗歌、圣

经导读、圣经辞书等已超过一百种。这批图书传播了圣经知识，但其中不少仍停留在简单介绍的局面，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人们深入了解圣经的需要。

为了使国人对圣经有更充分的了解，并推动学术界对圣经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组织了一批内地和香港的学者、研究生合作编出这套“圣经文化解读书系”。书系由6卷构成，第一卷综述圣经形成的背景、其正典化过程、内部结构、在后世的传播和阐释，及其对后世文化的深远影响；第二卷至第六卷将圣经卷籍分成5种类型依次评述，它们是：1、律法书、叙事著作；2、诗歌书、智慧文学；3、先知书、启示文学；4、福音书；5、《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全书的理论深度和文字风格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既从基本常识谈起，又尽量体现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就和作者的研究成果，使一般读者和学者都能从中受益。语言则力求准确、简明、优美、活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知识性、学术性和较高文化品位的统一。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及纪念黄传经先生之基金的赞助，特致谢忱。由于资料准备不足，学术水平欠缺，书中肤浅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诚邀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2003年3月1日

〔注释〕

① 见杨牧谷《Canon（正典）》，载《当代神学辞典》上册，第179-181页。

② 见《提摩太后书》3:16-7。参见周天和《“传统教导”与“圣经研究”》，载卢龙光编《读经、研经、释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2000，第10-18页。





③ 参见 C. H. Pinnock, 'Revelation', in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d. Sinclair Ferguson & David Wright,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585 - 587.

④ 卓新平《圣经鉴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页。

⑤ 参见 F. F. Bruce, *Canon*, pp. 19 - 22.

⑥ 参见 Raymond E. Brown, *An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⑦ 参见 James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 I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 of Earliest Christianity*, 2nd ed. London: SCM, 1990.

⑧ 参见 F. 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18 - 19.

导 言

神学上的启示谓之神的自我揭示。圣经中充满启示。这种启示藉着神的语言和行动首先降临给犹太民族的先知，而后通过耶稣基督完成了终极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圣经中的《新约》是在属于犹太教的《旧约》启示基础上形成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因此有着内在的血缘联系，它们因此都被称为启示宗教 (religion, Revealed)。作为圣经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旧约》先知书和散布在两约中的启示文学也具有内在的亲情，它们也都是启示的产物，并且在圣经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先知书横向贯通历史书，纵向串连律法书和《新约》，上承《创世记》，续写了人因违抗神命堕落犯罪后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罪恶，填补了人与神隔离之后天上人寰之间的空白；沟通了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化预言为现实中的见证；同时启发了启示文学，把现实与未来连接为一体，以新的启示形式发出了末日信息，所以创作意义格外重大。这要从宗教的、意识的、神话的、历史的、时代的、政治的、思想的根源具体说起。

先知书首先是圣经中一部组合而成的神学文集，是公





元前8世纪中叶至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先知运动的产物。当时，前仆后继地宣告灾难将至的先知们汇成了一股时代的大潮，由于他们宣告的消息彼此非常接近，人们甚至“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单一的、首尾一贯的宗教思想团体”。^{〔1〕}此即所谓正典先知。其实他们的宗教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继承独特的民族宗教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种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即对亚伯拉罕和摩西以来所形成的先知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因此它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有重大贡献，代表了承前启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发展阶段。

宗教是人的意识的产物，精神的家园，但它须臾离不开土地，因为土地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很难设想一个民族会常年背井离乡，一直在寻找精神的家园。犹太民族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记忆中，它以始终不渝地向往一个圣地、忠实于一个神、坚守一个宗教理想而著称于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它的独特的神选观，即人，独尊一神；神，以犹太人为“特选子民”，并赐其“应许之地”。这个神就是全体犹太人的上帝——耶和華。他说过：“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申5：6-7）“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意即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中挑选的特等子民，肩负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是指神应许给犹太人始祖的土地：“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13：15）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犹太人必继承的迦南全地。神的启示贯穿于整个古代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历史之中，犹太教连同由之诞生的基督教因此成为严格的启示宗教。这种启示正如圣经所示，来自惟一神——上帝；上帝总是通过他所选定的

人昭示神的意志,这些人因此成为先知先觉者,从而负有崇高的历史使命。犹太传统认为,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折都是由神的拣选者——先知完成的;作为被拣选者,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时代的先行者。这个传统被基督教所继承,耶稣就是圣经中最大的先知,神最终通过耶稣实现了他的终极启示。先知书和启示文学记录了这一发展过程,并且它们本身就是接受启示的结果,都典型地、艺术地体现出神通过启示显示自身的特征,因此在圣经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创作意义。

宗教与神话血肉相连,但它又不固守神话而与世俗中的人同呼吸、共生存。基督教的圣典——圣经也起源于神话,并从神话向世俗不断演化,从上帝到耶稣,多方面地记录并完成了神——人——神的发展变化过程。其中,启示的接受者先知是重要的媒介。正典先知创作的先知书不仅成为圣经创世神话、律法神话向弥赛亚和“道成肉身”神话发展的中介与桥梁,也就是说《新约》广泛接受了先知书的启示,不仅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最重大的现实的启示;而且它还孕育、启发了启示文学,在两约之间极为繁荣的启示文学中,把现实目的和终极追求都集中在绝对的精神范围,演化为对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对天国理想的追求,从先知描述的惩罚之后必将到来的理想的弥赛亚时代,到《启示录》所揭示的“新耶路撒冷”的神话,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基督教末世论的框架,为整部圣经从神开天辟地到人类的最终结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宗教产生于历史深处,是历史的产儿,并与历史相濡以沫。犹太教和由之诞生的基督教也不例外。上帝惟独挑选亚伯拉罕的氏族为选民,赐予其一块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以此换取犹太民族以上帝为惟一神。这种独特的约定不仅为





世界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奠定了基础，而且由此开启了一部天地、人、神三位一体的充满悲剧的特殊民族历史。此即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神——西奈的神，一个民族——以色列，和一个地区——圣地的融合。犹太教的历史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历史。”^{〔2〕}如果说犹太民族是这时间、地点、情节相一致的“三一律”的历史悲剧的主人公，那么《旧约》就是这段悲剧历史最伟大的创造；诞生于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历史的中点——希伯来王国自黄金时代之后走向分裂、衰落之际——的先知运动以及先知书，因此而成为最富悲剧意义的历史的见证，并启发、带动了启示文学，填补了两约之间希腊化和罗马暴政时期悲剧历史的空白，预言并开启了基督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宗教总是应和着时代的脉搏与时代息息相关，不论彼此怎样消长。先知辈出的时代，正值人类进入一个思想普遍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世界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大建树的著名思想家，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前10—前7世纪间人）变革古代的波斯宗教，创立了善恶二元论；释迦牟尼（Sakya-muni，前565—前486，一作前563—前483）主张无我，相信灵魂转世，在东方缔造了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孔子（前551—前479）在整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治国安邦、待人处世的政治、伦理道德学说，奠定了自己一代宗师的地位；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这个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宣布了自由思想的权力和必要性，论证了人的行为的理性原则……希伯来的先知们则悬置理性，带来了一场以人及其信仰为思维中心的“先知革命”（prophetic revolution）。因为他们执著于传统的圣约思想，“坚信自己与耶和华上帝有某种特



殊关系”，能够“掌握了上帝的意图，并传达其意愿和判断”^{〔3〕}，相信并确立了对惟一神的信仰高于一切；强调个人包括民族只有主动、自觉地归向、信靠上帝，与上帝同在，把信仰落实在伦理道德的实践上才能生存，这不仅为纯洁民族宗教、确立一神教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确认了信仰构成人的生存的最内在的核心，坚信人类未来必得救赎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在精神与历史等不同层面为民族及人类预期了可能有的理想的归宿。先知书和启示文学中描画的“新天新地”的美景至今为人类所向往，人们甚至说：“也许先知们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他们关于‘救世主’（Messianic）时代的幻想，一个关于拯救的幻想，即人通过他的自我意识而得以拯救的幻想。救世主时期，正如先知们看到的，意即在伊甸园中施加于人们的诅咒消失时期。”^{〔4〕}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政治总是难解难分。先知运动发生的时代也是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充满激变与动乱的时代。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希伯来王国由分裂而衰亡，随后，摧毁了希伯来王国的亚述帝国也从强盛一时而走向衰败；巴比伦竟被波斯人轻而易举击败，希腊的雅典虽在与波斯人的较量中获胜成为希腊的霸主，但是其后与斯巴达的内部争战却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正是面对如此复杂的政局，先知们不以胜败论英雄，而是极力彰显神的公义的品格，倡导并倾心致力于铲除罪恶、实现社会公义的理念。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高扬惩恶扬善、反对强权、保护贫弱者、要求绝对社会公正的大旗，提出了通过彻底的宗教精神、通过道德自我更新净化社会、变革政治的思想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知运动也是一种彻底的社会改革、道德改革运动，先知书因此充满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信念。



总之,关于上帝问题的讨论历来是各种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如果人类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那么这棵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之树也应该是常青的,先知书和启示文学就是这棵树上引人注目的果实。因为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这些曾几何时辉煌无比的帝国霸业从此永远地灰飞烟灭了,仅仅构成历史记忆中永恒的一瞬;然而思想家们,包括希伯来先知的业绩,虽饱经历史的沧桑至今依然被人们念念不忘。在这些历久而弥新的业绩中,先知书写就了独一无二的闪光的一页。说它独一无二,是因为在这些思想的硕果中,它并不属于令世人瞩目的有所创立与建树的一族,而是凤凰的涅槃,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预言毁灭,在毁灭中燃起希望的惟一。一般来讲,创立与建树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在于它是开端,每一个开端都很容易被历史所铭记;然而批判与毁灭的伟大常常难以被世人理解,但它对于劫后重生的人们却更为可贵,因为它的伟大无法依靠业绩记载与度量,而只在于思想的结果,这种思想的结果就是对后人可能有的启示。

的确,如果拨开先知书和启示文学所启示的神学救世光环,我们会发现:姑且不论贯注在人类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的先驱者所具有的强烈先知意识,单说深深印刻在先知书和启示文学中的忧患意识,至今仍未失去其对现实的深刻启示意义。正如西方当代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在充满动乱和危机的年代,启示文学往往比较发达,对过去时代的启示文学的兴趣也往往产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们因此在现当代世俗文学中也发现了启示文学的踪迹,认为“在现代,启示文学复兴,常以科幻作品的形式出现”^[5]。它甚至还演变为小说的一种类型,用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把启示文学划归为小说的一种类型。这种情